



錢鍾書和他時代

廈門大學錢鍾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謝泳 編

錢鍾書和他時代

廈門大學錢鍾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錢鍾書和他的時代——廈門大學錢鍾書學術研討
會論文集 / 謝泳主編.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 2009.03
面 ; 公分. -- (語言文學類 : AG0097)

BOD 版

含參考書目

ISBN 978-986-221-189-2(平裝)

1. 錢鍾書 2. 學術思想 3. 文學評論 4. 文
集

848.6

98003640



語言文學類 AG0097

錢鍾書和他的時代

-- 廈門大學錢鍾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編 者 / 謝 泳

主 編 / 蔡登山

發行人 / 宋政坤

執行編輯 / 賴敬暉

圖文排版 / 姚宜婷

封面設計 / 陳佩蓉

數位轉譯 / 徐真玉 沈裕閔

圖書銷售 / 林怡君

法律顧問 / 毛國樑 律師

出版印製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583 巷 25 號 1 樓

電話: 02-2657-9211 傳真: 02-2657-9106

E-mail: service@showwe.com.tw

經銷商 /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 121 巷 28、32 號 4 樓

電話: 02-2795-3656 傳真: 02-2795-4100

<http://www.e-redant.com>

2009 年 3 月 BOD 一版

定價: 240 元

• 請尊重著作權 •

Copyright©2009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 Ltd.

目次

錢鍾書對新人文主義的誤讀／龔剛	1
神秘主義並不神秘——論錢鍾書對無言詩學的超越／黎蘭	9
讀《寫在人生邊上》札記／高恆文	25
錢鍾書與《紅樓夢》／王人思	39
錢鍾書先生怎麼看《心史》真偽問題／陳福康	69
錢鍾書早期的「異國形象」研究——《十七、十八世紀英國文學中的中國》及其他／賀昌盛、孫玲玲	75
一個文學社會學意義上的「方鴻漸」／徐雁	97
錢鍾書研究四題／謝泳	121
喬治·奧威爾在中國的傳播歷程 ——兼說錢鍾書夫婦與喬治·奧威爾／林建剛	139
錢鍾書與侯外廬——關於錢鍾書的一封信／龔元	149
《圍城》中的學位制度考察／楊寧	159
錢基博、錢鍾書父子的圖書館情緣／殷洪	175

附錄.....	187
錢鍾書學術研討會議程.....	187
錢鍾書學術研討會參會人員名單	188
錢鍾書學術研討會籌備日誌	189

錢鍾書對新人文主義的誤讀

澳門大學中文系

龔剛

錢鍾書曾在上海寓居多年，對上海的世情風物了然於心。《圍城》女角孫柔嘉的精明務實，另一不甚起眼的角色張吉民的崇洋和勢利，就頗能代表上海人的性格，或者說，頗為符合「外省人」對上海人的想像。

近日翻看錢鍾書的英文著述，意外發現了一則談論上海人的短札，原題為「Apropos of the Shanghai Man」(〈關於上海人〉)¹，刊於1934年11月1日的《中國評論週報》(The China Critic)。

此文雖極簡短，但閱讀障礙卻不小，其間摻雜著一些法文、專有名詞(如白璧德主義，拉伯雷式的幽默)，還引用了波德賴爾、喀塞克斯的詩文和議論，用詞也相當古奧，接近於《談藝錄》或《管錐編》中的一則。

此文的靈感來自於六十年前某個周日的午後。其時，錢鍾書正走在南京路，天陰，人流擁塞，鬱悶中，波德賴爾的詩句浮現眼前：

「天空：巨大的黑色壺蓋，無數世代的人類在壺中沸騰。」

¹ 全文見附錄。

喀塞克斯式的感傷也隨之而生；那些充塞上海街頭的路人，百年之後，將無一倖存。

以上算是起興。

其後，錢鍾書切入正題說，北京人屬於過去，上海人屬於現在，甚至屬於未來。言辭間對上海人頗為推許。但何以上海人就該是新人類或新新人類，北京人就該是遺老遺少，錢鍾書卻未置一辭。

錢氏著書，雅好「發凡張本」，且寄望後來者「於義則引而申之，於例則推而益之」。²此處的上海人北京人之辨，顯係張本之論，非「引而申之」不足以暢其義。

北京乃六朝古都，多皇家遺址，多堂皇廢墟，百年風沙難掩一脈王氣。北京人以天子腳下臣民自居、自傲，遛鳥閒談間，也透著不可方物的神色。作為北京普通民居的四合院頗有點小紫禁城的意味，門一關，老子天下第一，窗一掩，管他春夏和秋冬。世變雖亟，老北京的舒緩步態卻依然故我。北京城因而宜於魯迅鈔古碑，知堂喝釀茶，西諦訪詩箋，老舍談小吃。上海並無輝煌的歷史可供炫耀，開埠之前，不過是一鄉野之地，上海人因此也無歷史包袱可背，輕裝上陣，崇洋趨新，遂建成遠東第一都會，其情形頗似本為小漁村的深圳一變而為繁華之城。發了跡的上海人，開始瞧不起「外省人」，開口「阿拉上海人」，閉口「鄉巴佬」，其種群區分的認真程度，實不亞於古中國人之夷夏大防，白種人之歧視黑人。人難免忘本，上海人大概也生怕讓外人看見其「鄉巴佬」祖宗的牌位。

北京人和上海人，一遺老，一新貴，皆有傲慢之底氣與心氣，兩者相遇，當有一番好戲看。浮沉幾度的京派、海派之爭，表面

² 見牟曉朋等編：《記錢鍾書》，第100頁，大連，大連出版社，1995。

看來只是學術風格、藝術風格的衝突，一者以嚴謹保守自持，一者以人膽變格自命，但就其深層的人文氣質而言，則是一場文化遺老與文化新貴不可避免的交鋒。這場交鋒註定會像「百年戰爭」一般膠著，海派的天馬行空撼不動京派的穩紮穩打，京派的穩紮穩打也繫不住海派的天馬行空。作為旁觀者，只要有熱鬧可看也就心滿意足了。

北京曾以八大胡同聞名，上海曾以十里洋場著稱。八大胡同乃傳統青樓文化之餘脈，留連其中之舊文人，所鍾情者在於蘇小小式的「古典美」，十里洋場乃西風東漸之要衝，出入其中之新派文人，尋找的是穆時英式的「新感覺」。當古典主義者懷抱舊夢、淺斟低吟之時，「新感覺派」已劃著瀟灑的「狐步舞」，衝出了歷史的藩籬。錢鍾書所謂北京人乃昔之中國人、上海人乃今之中國人之說，於此亦得一佐證。

錢氏又謂，彼時中國文學中之「上海人」乃白璧德主義者之代名詞，精明，講效率，善於克制，自以為是，且有少許粗俗習氣和市井氣。國人皆知上海人「精明」，「精明」二字倒確乎可以作為上海人的商標。民國時期海上作家張愛玲、蘇青以細膩近於瑣碎地筆觸刻劃了不少上海小市民，他們棲居於逼仄的弄堂，精打細算著生計，也精打細算著愛情。張愛玲因而拈出「個人主義」這一當時頗為摩登的新名詞標記其筆下人物，倒還算實在³，遠不如錢鍾書端出的「白璧德主義」這枚大印讓人感到出奇。白璧德（Irving Babbitt）在民國時期的學界可是一紅人，其名聲僅次於羅素、杜威，吳宓、梅光迪、梁實秋等文化名人皆是其中國門生。白璧德乃「新人文主義」領軍人物。「新人文主義」作為二十世紀

³ 參閱拙文〈西方個人主義的東漸與「變形」：以張愛玲《傾城之戀》為個案〉，《中國比較文學》2008年第3期。

文化保守主義派別，力圖復活古典人文精神以解救西方現代社會的危機。該流派大唱「人道主義」的反調，以為後者肯定感性欲求和人的自然權利，乃是打開了潘朵拉寶盒，導致任情縱慾、道德淪喪，遂主張以道德理性節制情感，通過自律、克制來達到個體完善。錢鍾書稱上海人為「白璧德主義者」，言下之意即是說，正宗的上海人都是些「新人文主義者」，這頂帽子實在太高太大，倘若套在孫柔嘉、張吉民、范柳原、白流蘇之類人物頭上，恐怕會招來沐猴而冠之譏。

上海人精明、善於克制，其氣質確實類乎「新人文主義者」，如果由此而把兩者劃上等號，那就是皮相之見了，用錢鍾書本人的說法，這叫「強瓜皮以搭李皮」。道理很簡單，「新人文主義」強調的是人應當以道德理性節制情感，而不僅僅是主張人應當善於節制。柏拉圖把人的靈魂分成理性、激情、慾望三部分，進而強調人應當以理性駕馭激情和慾望，他所謂理性，也具有道德理性的內涵。⁴柏拉圖的弟子亞里斯多德雖然在影響焦慮的潛意識作用下喜唱師傅的反調，但在主張以理性節制慾望、以美德的追尋為存在意義這一點上卻到底沒有跳出柏拉圖的掌心，他還特別強調節制（temperance）德性乃通向至善（the highest good）的必由之路⁵，以上述理念為核心，衍生出西方古典倫理學史上著名的「亞里斯多德主義」。中世紀之後的西方古典主義試圖通過復興古希臘文化以療治西方人的心性，其中就包含著古希臘式的以理制慾的用心。新人文主義顯然是從亞里斯多德主義到西方古典主義這條思想脈絡上結出的一個新品種。這貫通西方思想史的三大主義

⁴ 柏拉圖：《理想國》（郭斌和、張竹明譯）第四卷，第169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

⁵ Aristotle, *The Nicomachean Ethics*, 1153a, translated with Commentaries and Glossary by Hippocrates G. Apostole, Holland: D.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體現出西方歷代哲人試圖馴服慾望這頭怪獸的不懈努力，這種努力和伸張自由意志、崇尚自然權利的西方自由主義傳統看似對立，實則具有互補關係。國人對自由主義個人主義（liberal individualism）的最大誤解就是誤以為該思想流派乃是個人利益、個人慾望的形上說辭，並把該流派判定為任情縱慾、道德淪喪等末世主義道德罪的教唆犯。其實，古典自由主義的精義恰恰是主張自由的前提就是限制，這表明自由主義傳統實則和亞里斯多德主義難以判然兩分，兩者的互動恰恰催生了自由意志與秩序並重的西方現代文明。清代朴學家戴東原在他的名著《孟子字義疏證》中反對存天理而滅人慾，主張「遂民之慾」，「節而不過」，簡直可以說是合亞里斯多德主義、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的思想精義為一體，也可以說是原始儒家「樂而不淫」理念的精確注腳與合理延伸。⁶

就實質而言，上海人的克制與新人文主義主張的以理制慾及戴東原式的「節而不過」根本搭不上邊，新人文主義者與戴東原所主張的節制，是以至善為目標，上海人的克制是為了更好地實現個人利益。上海人的精明就體現在他們不會因為感情衝動而作出最終有損自己利益的選擇，比如，一些上海女人絕不會因為動了感情就嫁人，她們和白流蘇一樣，首先考慮的是一場婚姻給她們帶來的物質利益。換言之，上海人用以馴服慾望和激情的繩套，並非道德理性，而是實用理性。錢鍾書把「新人文主義者」這頂高帽套到上海人頭上，委實套錯了地方。

⁶ 參閱拙著《儒家倫理與現代敘事》第六章第二節「儒家倫理與現代性謀劃的相容性：以戴震的『理欲』說為例」，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8年1月。

附錄

錢鍾書〈關於上海人〉原文

Apropos of the “Shanghai Man”

Chien Chung-shu

Walking along Nanking Road in a sunless Sunday afternoon, I recalled in a flash the concluding lines of Baudelaire's *Le Couvercle*:

“Le ciel! couvercle noir de la grande marmite Ou bout l'imperceptible et vaste Humanite. (The sky: the black lid of the mighty pot Where the vast human generations boil!) ”

The lines seemed suddenly to embody themselves before my eyes. The gloomy overcast sky and the seething throng of human animals conspired to jerk, so to speak, these terrible lines into concrete visualisation. And especially the vast throng of Sunday-making people, so stupendous and overwhelming! The very thing to move Xerxes to tears over the sentimental reflection that not one of these multitudes would be alive when a hundred years had gone by.

Just as the “Peking Man ” (that paleontological reconstruction) is the Chinaman of the past, so the “Shanghai Man” is the Chinaman of the present, and — who knows? — might be that of the future too. In

current Chinese literature, the term "Shanghai Man" has long been used as the synonym for a Babbitian sort of person, smart, efficient, self-complacent, with ever so slight a touch of vulgarity. He has the best of everything and is healthily innocent of all spiritual fermentations. Mammon is in Heaven and all's right with the world! Like the poet, the "Shanghai Man" is born, not made. Not everybody living or buried alive in Shanghai can be the blessed "Shanghai Man." We poor journalists, for example, have certainly no claim to that honorific title. And of that huge Sunday-making crowd at least twenty per cent have been merely compelled to seek their living here, unadapted and unadaptable to Shanghai. I know many persons who have spent twenty or thirty years in Shanghai and yet remained to the end strangers in a strange land.

Now this failure to adapt oneself to one's milieu may be a case of what Bergson calls *raideur* and therefore fit for ridicule. But we might be mistaken; for this apparent *raideur* is perhaps the sign of strong character and superior intelligence. Have not men of powerful intellect and fine sensibility often complained within our hearing that they felt out of their element in Shanghai, or that they at once despised and envied the contentment of the "Shanghai Man" with his environment? It is no sheer accident that the campaign for humor inaugurated by the *Analects Semi-monthly* should have started among the Shanghai Intellectuals. In an article published in the *China Critic* several years ago, Dr. Y. T. Lin made a superfine analysis of the varieties of Chinese Humor. But this New Humor (of which Dr. Lin is himself the sponsor) is the Old Humor writ small: there is no Rabelaisian heartiness or Shakespearean broadness in it. It is full of subtle *arrierepensees*, refined

petulance, and above all a kind of nostalgia as evinced in the loving memory of the academic life in Europe, the rehabilitation of the culture of the Ming dynasty, etc. This shows that our New Humorists are really out of humor with their surroundings and laugh probably because they are too civilised to weep.

A publicist lately spoke on the lack of "Culture" in Shanghai. He talked of founding libraries and other "cultural" institutions with a view to bringing sweetness and light to Shanghai. Sweetness and light indeed! Can there be anything other than sourness and gloom under "this black lid of the mighty pot"? (The China Critic, November 1st, 1934)

神秘主義並不神秘

——論錢鍾書對無言詩學的超越

廈門大學中文系

黎蘭

鄭朝宗先生曾公佈錢鍾書談論《管錐編》獨創性的的一封信，「弟因自思，弟之方法並非『比較文學』，in the usual sense of the term，而是求打通」，實例之一為「論哲學家文人對語言之不信任」，且認為在這一點上自己已「『打通』而拈出新意」¹。可見，這是錢鍾書關於語言問題思考上的頗為自得的一大創見。當今學者對錢鍾書語言思想的論述並不罕見，但卻似乎尚無人論及這一論題。那麼，這話到底意味著什麼？錢鍾書的創見到底何在？這創見是小結裏的發現還是意在與當代語言哲學家對話？對我們現在的語言思考又有何啟迪呢？

一

錢鍾書指明，這論斷出自《管錐編》406 頁，按圖索驥，我們看到了對老子「道可道，非常道」的論述。此章已為錢學研究

¹ 鄭朝宗《管錐編》讀者的自白[N]，北京：《人民日報》，1987 年 3 月 16 日。

界慣用熟知。錢鍾書大量引用了哲學家如柏拉圖、黑格爾、尼采、墨子、斯賓諾莎、霍柏士、邊沁、毛特納，文學家如陸機、陶潛、劉勰、黃庭堅、但丁、歌德等的言說，證明「責備語言，實繁有徒」。嘖有煩言的事實是：語言文字為人生日用所必須，是文人安身立命的地基，乃哲人著書立說的工具，但語言在傳情、說理、狀物、述事上總不能無欠無餘，清晰完整地傳達人們內心的思想與情意。人憑藉語言進行思考進行交流，但語言卻總造成迷誤滋生誤解，「常恨言語淺，不如人意深」。內在的情思轉化為外在的文字表達的挫敗，使得哲學家文人對語言不信任。為保持內在性靈和思維的完整性，只有走向沉默，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就是這種思想的極致性表達：「以為至理妙道非言可喻，嗣墨洛誦乃守株待兔」，「《老子》開宗明義，勿外斯意。心行處滅，言語道斷。」²

錢鍾書總結道：「語文之於心志，為之役而亦為之累」。語言為人生大本之一，「人非呼吸眠食不生活，語言僅次之，公私百事，胥賴成辦。潛意識之運行，亦勿外言言語語」³，憑藉語言，我們才領會了世界認識了自己；但語言又是惑亂心目滋生繆妄的源頭，是時時可能帶來麻煩的禍根。不能用又不能離，與這狡猾若虵蛇的語言周旋則成了人類的命定的承擔。因此，指出「哲學家文人對語言的不信任」這一事實的來龍去脈，顯現出的是康德意義上的語言批判意識，錢鍾書邁出了走向語言本質的探究之途的第一步。

值得注意的是：在正本清源的推演中，錢鍾書將「道可道，非常道」解密為「語言之於心志」問題的「充類至盡，矯枉過正」

² 錢鍾書，管維編[M]，北京：中華書局，1979。

³ 錢鍾書，談藝錄[M]，北京：中華書局，1984。

的表達，並引用了海德格爾「人乃具理性之動物」本意為「人乃能言語之動物」的名言，同時將古希臘文的 *logos* 直接翻譯成「道」（原文為「古希臘文「道」(*logos*) 兼「理」(*ratio*) 與言「*oratio*」兩義」)，錢鍾書將中國最具形而上神秘色彩的話題轉化成了當代語言哲學最為關注的思想與言說的關係，古今中外在此打通了。那麼，拈出的新意又是什麼呢？

世俗恒言：「知難而退」；然事難而人以之愈敢，勿可為而遂多方嘗試，拒之適所以挑之。道不可說，無能名，固須捲舌緘口，不著一字，顧又滋生橫說豎說、千名萬號，雖知其不能盡道而猶求億或偶中，抑各有所當焉。談藝時每萌此感。聽樂、讀畫，觀好色勝景，神會魂與，而欲明何故，則已大難，即欲道何如，亦類賈生賦中鵬鳥之有臆無詞。巧構形似，廣設譬喻，有如司空圖以還撰《詩品》者之所為，縱極描摹刻劃之功，僅收影響模糊之效，終不獲使他人聞見親切。是以或云詩文品藻只是繞不可言傳者而盤旋。亦差同「不知其名」，而「強為之名」矣！⁴

「道不可說、無能名，固須捲舌緘口，不著一字」，這是中國傳統哲學和詩學中最經典的命題：大美無言；「顧又滋生橫說豎說、千名萬號，雖知其不能盡道而猶求億或偶中、抑各有所當」，錢鍾書向傳統進行了挑戰：繞不可言說而盤旋，而且這種言說不再以司空圖《詩品》不能使人聞見親切「巧構形似，廣設譬喻」方式。那麼，什麼是使他人聞見親切的方法？難道尚有一種不用比喻來言道的方式？

⁴ 錢鍾書，管錫編[M]，北京：中華書局，1979。

錢鍾書曾說，「我一貫的興趣是所謂的現象學」⁵，前文中用海德格爾的語言來解密老子的「大道無言」，已經看到他對海德格爾的重視和認同，在下文的論述中我們還可以看到海德格爾經常成為了他關鍵論點的支持者。因此，借用海德格爾的思想來理解錢鍾書在此遇到的挑戰和應對的思路，可以說正思想的相互照明應有的效應。海德格爾在意識到胡塞爾的意識現象學仍然未脫離主體性的框架時，超出的思路只能從對象性轉化為基本本體論，將對「意向性構成」的理解生存化為「投入的生活體驗」，而「達到這樣一個事情本身的領域只能通過向這個事情的純投入」⁶。張祥龍先生闡釋道：「要做出這樣的回答，就不可避免地要超出一切還以主客分離為前提的、認識論型的現象學，『投入』更本源的實際生活體驗中；尤其是要表明，這種生活體驗本身具有由它本身構成的而非外加的可理解性，而且這種理解可以被非抽象化地但又是貼切地（不僅僅是「象徵性地」）表達出來。」⁷以此為參照點，我們可以看出，錢鍾書對司空圖的不滿，類似於海德格爾對胡塞爾的不滿，因為《詩品》談藝，正是象徵性的「以象擬象」，「以鏡照鏡」⁸，而能在鏡中顯形的當然是一對象化的實體，多方比喻，不過是以語言去反映那個和語言同構的現實，這種考察只能是外在的、靜止的描述，當然達不到「使人親切聞見」的效果。錢鍾書對司空圖的否定，顯現的正是翻進一層決心：突入「不可言說」的內部，如庖丁入解牛，與「不可言說」周旋。「神秘經驗，初不神秘」⁹，這不正是投入「不可說的內部」後與同化後的自得與自信？

⁵ 胡範鐸，錢鍾書學術思想研究[A]，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

⁶ 海德格爾，哲學的概念與世界觀問題[M]，轉引自張祥龍《海德格爾傳》。

⁷ 張祥龍，海德格爾傳[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

⁸ 錢鍾書，談藝錄[M]，北京：中華書局，1984。

⁹ 錢鍾書，談藝錄[M]，北京：中華書局，1984。